

1937 - 1945

日本侵华决策史 研究

雷国山 著

5

学林出版社

K265
19

日本侵华决策史 研究

1937-1945

雷国山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 1937~1945 / 雷园山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730 - 140 - 6

I. 日... II. 雷... III. 日本—侵华—决策—研究—1937~1945 IV. K2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4860 号

日本侵华决策史研究(1937—1945)



- 作 者——雷园山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9.5
字 数——21 万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730 - 140 - 6/K · 9
定 价——18.00 元



著者简介

雷国山，1971年生，重庆人。1994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同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攻读日本文化专业硕士学位。期间的1996年赴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在安丸良夫教授指导下撰写并完成硕士论文。1997年在北外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南京大学日语系任教。2001年考入本校历史学系民国史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张宪文教授，200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代表性论文有《论“小日本”一词》(1999)、《战后中国东北日本开拓民的逃难及滞留情况初探》(2002)、《走向大东亚会议的历程》(2005)等，另有编著3种，译作多篇。

E-mail: leiguoshan@sina.com.cn

导 言

对于1937—1945年期间的日本侵华决策,应该如何去研究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仅仅考察决策内容为好,还是一并考察决策过程?本书选择的是前者,同时也兼顾了后者。

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什么叙述方式来阐述这些主要决策,第二个问题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研究这些决策,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去收集和解读相关的材料。

关于叙述方式,一般有两个,一是按照日本内阁的更迭来记流水账,二是用一条主线把日本在八年期间的对华决策串联起来。本书采用的是第二个:从1938年日本政府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到1940年日本政府提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把这两个“点”连接起来,无疑构成了1937—1945这八年期间日本对华政策的主线。本书以日本在1938年提出的国策——“建设东亚新秩序”为论述的核心,通过梳理“东亚新秩序论”的公开提出(1938年11月),其内涵的演变到“大东亚共荣圈论”的登台(1940年8月),直到日本“东亚新秩序”的野心失败这一过程,来阐明八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脉络。

关于研究角度,本书设定了如下几个:(1)“东亚新秩序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从其提出、改造到理论体系化的完整过程,以及“东亚新秩序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同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2)“东亚新秩序”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联系与区别;(3)日本实施“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三个阶段;(4)“东亚新秩序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在实践上为什么会失败。这些研究角度搭建起了本书的基本框架。

关于第三个问题,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在当时已经被国际化(超出了当事二国的处理范围),所以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本书在收集和解读材料时特别注意联系当时具体的国际环境。在解读材料时,在深层次上,是把日本的侵华战争放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纵线上去看待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主要是效仿了先发型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

此外,还有一个相关术语的问题,那就是在日本档案中,近代日本一般称中国为“支那”。据调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专门的决定,称中华民国为“支那共和国”,简称“支那”或“支”。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日本政府所说的“支那”并不是指一个完整的中国,而是仅指“关内中国”部分。而在理解这一时段的时候,还应该了解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同日本缔结《日华基本关系条约》以后,日本政府文件里所说的“支那”,不再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管理下的关内中国,而是指以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汪伪政权为中央政府的中国(该政权的目标在于统一关内中国)。其次,在日本政府的文件里,只

有“北支”和“南支”在地理范围上大体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北”和“华南”这两个地区相符，而“中支”一词指代的是长江流域的省份，大体上相当于“华中”与“华东”这两个区域，并且还应包括四川，但是它在实际指代时则是偏重于华东地区的。

本书对所引日文原档案中的如下词汇未予改译：“支那”、“支”、“北支”、“中支”、“南支”、“日支”、“日满”、“满支”、“日满支”、“日满支三国”、“日华”。但对于那些已经译成中文出版的史料以及已经出版的中文论著，尽管它们与本文采用的用语标准不一样，但本书在行文过程中直接加以引用，未予改动，特此说明。

二

了解日本的“共荣论”在中国的源流，是理解本书结构的一把钥匙。

“东亚新秩序”这一口号是在1938年11月3日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公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口号则是在1940年8月1日由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公开使用的。其实，早在这两个政治口号之前，就已经有一个词被日本政府频繁用来表述其对华政策，这个词就是“共荣”。

日本在近代究竟何时开始把“共荣”一词运用到中国问题上，已经很难考证。美国学者任达在他的专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里提到，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和中国携手谋事的思潮，于是有很多的日本教习到中国来，很多的中国学生也被清朝各级政府派去日本留学。那个时候

的日本思潮就是要缓和一下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恨,一时日本朝野流行“日清亲善”论。

其实,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以胜者的姿态向中国伸出亲善之手,目的自然是要败者听命于它。一句话,亲善,是出于利己的考虑。(要注意,当时并非日本单方面希望同清朝亲善,清朝自身也主张与日亲善。)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着欧洲大乱,自己则在中国拼命扩张商业和地盘,捞足了好处。“共荣”一词大概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比较集中、频繁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的视听的。1919年11月21日,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写给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情况。他在报告的开头就指出:“人们只知口头上大叫日支亲善、日支共存、日支共荣等,实际上却呈现出相反的现象来,这一现象正在日益浓厚,本职目击这一状况……”这大概算得上日本正史中较早使用“共荣”一词的证据了。但是也正如在这里所见到的,“共荣”这一口号从一开始就是涂上了虚伪色彩的。

从日本现存档案来看,1921年至1930年,还是“共荣”一词当道的时代。作为一种思潮,当时甚至比较时髦,比如有的日本公司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就干脆以“共荣社”或者“共荣XX社”冠名。笔者发现,这类公司基本上集中在中国东北,其主要业务又往往依托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最大国策公司——满铁公司。而日本陆军省于1930年3月6日决定设立的陆军兵工厂的福利会,它的机构名称就叫“共荣会”,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法人代表资格的组织。这些事实说明,在这十年中,“共荣”一词是被日本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用作侵华幌子的。从1930年直到“七七事变”,则是“共存共荣”一词盛行

的时期。板垣征四郎在1931年3月写的那篇有名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算是较早使用“共存共荣”一词的文献。大致说来，“七七事变”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政府一直在使用“共存共荣”一词。但是自从日本政府在1938年公开叫嚣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后，“共存共荣”一词在日本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诠释“东亚新秩序”这一国策，“东亚共荣圈论”登场以后，它的作用也是如此。

总之，“共荣”一词同本书要重点讨论的“东亚新秩序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都是有关系的。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东亚新秩序论”的提出及其实质	1
第一节 “东亚新秩序论”的提出	2
第二节 “东亚新秩序论”的内容与实质	18
第三节 “东亚新秩序论”提出后的国际反响	27
第二章 “东亚新秩序论”的改造与“大东亚共荣圈论” 的登场	37
第一节 精神总动员与对汪策动	38
第二节 “东亚新秩序论”的改造与“大东亚共荣圈论” 的登场	53
小结	102
第三章 “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最初实施	105
第一节 《支那事变急速处理方针》的确立与实 施	105
第二节 “大东亚共荣圈”的具体构想及指导理念 (1941年初)	136
第三节 日美谈判	146

小结.....	191
第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展开及其最终失败 ...	195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的助战政策.....	201
第二节 噩梦开始,日本谋求“日汪泰”行政一元 化.....	211
第三节 阿拉曼战役的结果对日本决策层的影 响.....	219
第四节 《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的出台及其实 施.....	232
第五节 “大东亚共荣圈”侵略理论的体系化	248
第六节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	257
第七节 “大东亚新秩序”的美梦破灭	261
小结.....	269
结语.....	272
史料及参考书目.....	284
后记.....	289

第一章 “东亚新秩序论”的提出 及其实质

“东亚新秩序”究竟是由何人最先提出来的这一问题，目前能达成共识的是日本近代政治家近卫文麿。但是在近卫何时提出了该口号这一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中国史学界往往把1938年11月3日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当作回答这一问题的依据，因为该声明中有如下的话：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予以拒绝。^①

但实际上，第二次近卫声明中的“东亚新秩序论”只不过是近卫内阁公开提出而已，近卫最初提出“东亚新秩序论”是在1937年11月11日招待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宴席上。

^① 《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出版，第277页。

当时他发表的演讲中有如下的话：

在东洋完全实现对赤化威胁的防卫，树立真实的国际正义并建设新文化，在这一使命上，日满两国无疑担有共通同责。……在此，我衷心祝愿盟邦满洲帝国作为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分担者能够日益取得健全的发展。^①

所以，对照把上面两段话，就会发现近卫关于“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早在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之前就已经成熟，确切地说，这一政治构想甚至在第一次近卫声明（1938年1月16日发表）之前就已经成熟。也就是说，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11月11日近卫在非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这一政治口号，一年以后，又在第二次近卫声明（1938年11月3日）中正式提出了出来。

第一节 “东亚新秩序论”的提出

为什么近卫在迎接伪满总理张景惠的宴会上（1937年11月11日）提出了“东亚新秩序”这一口号？这得从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以后的对华北战略说起。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其“国防”战略很快发展到侵占中国华北地区。华北在地理上与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邻接，不管从军事（防苏）上还是从经济（资源及商品市场）上看，华北都成了日本垂涎之地。所以从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直到卢沟桥事变为止，日本在华北频频生事，目的就是要控制华北。关于这一段历史，史料集《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

^① 庄司润一郎的论文：《日中戦争の勃発と近衛文麿の〈国際正義〉論》，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91号（1989）第41页。

料选编,中华书局,2000年)和臧运祜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讲得很清楚,卢沟桥事变正好是之前日本在华北制造的一系列事端的延续。从《华北事变》这部史料集来看,1936年是中日关系相对平静的一年,中日之间在进行着谈判,而日本的贪婪使得中国政府已经对日本丧失了继续谈判的意愿,因此读者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按照日本的黠武政策,既然中方不愿意谈判了,那么日本就势必再次动武;不但如此,由于日本垂涎华北多年,所以一旦华北起战事,也肯定会是一次类似于“九一八事变”的局部性战争。“卢沟桥事变”就是在日本的这种战略背景下发生的,并且发生以后,日本并没有像以前几次在华北所做的那样终止战争,而是迅速将其扩大化,对整个华北地区发动了进攻。

随着7月29日北平失陷和7月30日天津失陷,日本驱逐中国军队出华北的目的达到。这意味着日本控制华北的战略目标达到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列强干涉的可能性增大,所以日本政府要保有这一战果,必须迅速获得国民政府的同意。这就决定了日本政府得继续通过军事手段把中国政府逼迫到谈判桌前来。这样,日本政府改变了上海作战在既定计划中的配角地位^①,于1937年8月13日发动了上海“八一三事变”,将战火从华北地区扩大到了华中地区,其如意算盘是:如果能在淞沪战役中获得军事胜利,则可达到1932年的“一

^① 前引参谋本部第三课作《处理华北时局要领》规定:“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秦汝译自[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朝日新闻社1975年版,第156页。转自《汪精卫集团投敌》第60页。

·二八事变”的效果,即一面逼签协定,一面树立华北傀儡政权;如果中国不投降,则占领上海不管是从战略的角度,还是从经济、金融的角度来说,对日本都是相当有利的。^①

当时中国为了应对上海方面的战事,除了军事上努力作战之外,更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1937年8月29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接着又向国联提交了自卫声明书,主动将日本侵华战争的应对国际化。对此,日本内阁会议于9月2日决定将“北支事变”改称“支那事变”,近卫于9月5日在演说中首次明确日本将“不辞久战”^②,并于9月9日发布两通文告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9月11日日本公布第八十五号法律,即《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敕令),日本从法律上和财政上为战争能够长期化提供保障。面对日本的举动,中国也相应地整备起整体作战的态势:在外交上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惩罚日本的侵略行径(9月12日);其次是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为标志,国共两大党形成了抗日联合阵线,中国国内力量的整合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中方的态势又促使日本政府于10月1日制定《应对支那事变的纲要》。该纲要规定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冀、察、沪三方面,作战目的是“使支那迅速地抛弃战意”,一般方针是“依据形势,为了能长期用兵,应采取与之相关的必要措施”。^③至

① 本文在此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军事和经济上,上海位于日本本土和已经属于日本领土的台湾岛之间,是一处理想的中转站;在金融上,可以控制上海而破坏中国的金融。

② 近卫文庸:《第七十二回帝国議会における施政演説》,《近衛首相演述集》,外務省外交史料馆藏,簿册号:B-A-1-0-016。

③ 《支那事变重要記録写》,外務省外交史料馆藏,簿册号:B-A-1-1-342。

此,日方还在淞沪战役进行之际,就为战争长期化作好了准备。

日本的侵略行为遭到了国联的谴责。1937年10月6日的国联决议认为,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并决定中国政府提出的惩日要求由九国公约会议(后来定在布鲁塞尔召开)来解决。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罗斯福总统也发表讲话,都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10月7日,蒋介石发表呼应罗斯福总统讲话的谈话。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于10月9日发表外务省声明为自己辩护,声称日军的行动完全是“自卫行动”。10月27日,日本再次发表声明,一面宣布退出定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一面声称“日支纷争只有依靠对东亚的安定负有共同责任的两国间直接谈判才得解决”,^①意思是说,打算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日本也是希望谈判的,尤其希望作为战略同盟国的德国从中牵线,达到日本出兵的目的。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战争的继续自然不是好事,通过谈判可以缓和一下敌情。于是,德国作为中日双方共同的友好国家,自然成了调停的最佳人选。但是研究者们共同认为,德国之所以答应居中调停,也有它自身的考虑:既想保住对华经济合作的良好现状,又想保住日本这个东方的反共桥头堡,并力图说服中国也参加反苏同盟。陶德曼调停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对华调停始于1937年10月29日,当日他访晤了中国外交部长陈介,表示愿意斡旋中日谈判。但是就在陶德曼访问陈介的前一日(10月28日),日本

^① 《九国条约国会議不参加に関する帝国政府声明》,载《支那事变関係声明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簿册号:B-A-1-1-353。

已树起了“蒙古自治联合政府”，再度分裂了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而在军事上，陶德曼访问陈介的当日，“淞沪战事处境艰难，北战场亦形势不利”^①，这些情况决定了中方在对日谈判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国民政府是日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所以当11月5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时，陶德曼带来的日方七项基础谈判条件^②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日军虽然在上海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但日本政府担心一旦中国政府在日本攻克上海以后仍不投降，日本该怎么办。因为如果走到那一步，日本只好被迫往南京攻打，而这必然增加目标成本，甚至还可能引起国际社会干涉（日本特别担心苏联出兵南下）。所以就在蒋陶会谈的次日（1937年11月6日），日、德、意三国即在罗马签定防共协定，为日军指向南京的作战铺设好了外部环境。不但如此，同日，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也应近卫的邀请起程赴日。这是日本为了攻打南京的一个外交准备。1937年11月8日，近卫内阁发布《为实施国家

① 蒋介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罗元铮编著：《中华民国实录》（第三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077页。

② 11月2日，日本广田外相在同德国大使驻日大使狄克逊会谈时，详细说明了日本议和的七项基础条件：“1. 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照这个先例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 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后略）3. 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更。4. 停止反日政策仅指履行1935年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修改学校教科书等）。5. 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后略）6. 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7. 尊重外侨权利。”《德驻日大使（狄克逊）给德外交部电（文件第514号）》，急，1937年11月3日上午5时，东京发。载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2次印刷，第108页。